

让干实业的人有奔头

“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两句话引起网民强烈关注,联系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翻番”规划,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期盼,这些顺应民意的惠民“涨工资”改革目标,如何才能落到实处、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3月7日《深圳晚报》)

如何让幸福感和工资一起涨起来

绝大多数网民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等话题,必然格外关注,分外期待。虽然政府这样的提法或者说承诺听起来很美好,但一旦联系到现实,很多网友还是充满了无奈。比如说这几年自己的工资卡上的数字也在不同程度地看涨,但为什么仍仍感觉钱不够花呢?甚至说感觉现在的工资还没有以前经花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工资虽然涨得快,但却跑不赢CPI。当我们工资收入的涨幅总是跟在CPI涨幅屁股后面追赶慢赶,我们自然会感觉工资涨了,但比以前更不经花了,我们期待的幸福也打了折扣,注了水。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但要让工资涨,而且还要让幸福感随着工资一起涨。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需要控制CPI的涨幅。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就坦言,去年物价涨幅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为此,张平说:“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作自我批评。”从发改委主任的自我检讨中,我们得窥在过去的2011年,工资出现了上涨,但是幸福感没有相应的上涨的原因之一。这也警示在刚刚开始的2012年,政府应该把控制CPI涨幅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要继续让CPI偷走我们的幸福。

要让幸福感和工资一起涨,还必须注意到体制外职工的工资收入增长情况。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职工收入增长的难点在于如何提高非编制内、非事业单位、非公务人员、非央企人员的收入水平,因为体制内职工能受益于政策,但体制外职工就容易“被遗忘”。这就要求政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好蛋糕,要防止“政府能掌握的部分涨,而私营企业不涨”的现象,应通过推行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措施强化“体制外”职工工资制度的健全和落实,保证他们的口袋也鼓起来。

让幸福感和工资一起涨,这也是百姓的期盼,也是政府的责任,对此,我们既心怀抱待,又拭目以待。

苑广阔

3月2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座谈会,高层提到“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学雷锋活动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为全社会学雷锋树立榜样”。

低标准学雷锋未尝不可

今年的“学雷锋”活动特别高调,民间舆论的反应也比较热烈。民间建言中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即“让领导先学”。这民间智慧或民间诉求,无论从哪个角度、据何种理论,可以说和高层想到了一块。

民间的“学雷锋”,不管各时期官方对雷锋本人和“雷锋精神”怎样诠释,其主要精神内涵,就是“当好人、做好事”,和传统中的“行善”概念,没有太大差别。“雷锋精神不过时”的条件,固然与官方倡导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雷锋在大众中是个“好人”的形象,“利他”的精神与理念,涉及人们“处世为人”层面的基本认知。故而,许多倾心于做好事的人,对有没有官员的“垂范”并不在意。

民间雷锋的“精神内涵”中,“利他”或“与人为善”核心价值从未变更,雷锋品牌才得以常新而持久。

假若学雷锋的组织者都是“现成雷锋”,具备领导学雷锋活动的天然资格,这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官员学雷锋,采用最低标准才可能具有可行性。

雷锋舍不得买汽水喝,攒下几块钱来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如今的官员,要是不用公款大吃大喝,给纳税人省点钱,我看,这也算学雷锋。要是和世界各国一样,不把参加酒宴当成无可替代的公务活动,那就更好了。

我这么说并不夸张,汶川地震那么大的灾难,接受了约201亿元国内外捐款,这数额已经很多了,而公款吃喝每年要耗费约3000亿元,这还是多年前的数字。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能这样,因为雷锋不光有精神,还因为他身处群众之中。官员无庸置身于公共交通体系,在诸多生活领域实际存在这样那样的特权,和大众根本不属于同类人,如何才有可能和正常人一样考虑问题呢,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就算本来有好奇心,可能有时也难以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不为恶,不贪腐,不坚持特权,官员为个人积德,为社会大众造福,我以为这就是学雷锋,官员采纳低标准学雷锋,在诸多“小事”上试试,是可行的。

另外,当好人,大家对此要求都没有意见。“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这话是邓小平说的,“好制度”与道德典型的感召作用不是一回事,但对官员来讲,恐怕更重要。

黎明

1 减轻税负,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

“2011年辽宁奥克集团实现销售收入近27亿元,但困难也不少。”辽宁奥克集团总裁朱建民告诉记者,“一方面,上游石化行业垄断原材料,导致进料价格过高,企业利润下降;另一方面,承担的税负较高,特别是异地发展的子公司生产相同的高新技术产品,却不能享受总部15%的所得税优惠,不能有效抵减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高成本。”

近年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涨,税负负担沉重,不少人在实体经济领域“无心恋战”。不少企业反映,要缴纳的各种税费项目多达数十个,除了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还有城建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以及各种行政事业收费和社会保障缴费等,再加上一些地方以摊派、罚款、检查、评比、认证、培训为形式的各种乱收费,让企业不堪重负。

让干实业的人有奔头,必须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家束庆年建议,应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加大对实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比如,财政要用专项资金支持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减少企业研发成本,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地方财政要以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增增长点来安排支出,而不是围绕“GDP增长”来做预算。同时,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快出台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关配套措施,帮助企业形成积极的预期。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150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并推出一系列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据中信证券测算,这些财税政策每年可为小微企业减轻60亿~70亿元的税务负担。朱建民认为,相比放松对小微企业贷款限制等,减税和增加企业投入更容易实现。但这对困难重重的小微企业来说仍不解渴,应实施普惠的税收政策,全面清除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并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实施。

除了税费,实体企业的融资难度也在加大,融资成本不断提高。据业内人士介绍,过去一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上涨了40%~50%。“从一些小贷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贷来的钱,有些年利息甚至超过60%,企业根本没法承受,贷来的钱只能购买原料,大部分利润都要拿去还贷,生存环境极其艰难。”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公司负责人建议,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的同时,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事实上,为改变部分企业融资困难,宏观政策已开始进行调整。去年12月,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过去两年连续12次上调准备金率后的首次下调。

山东一家民营医院负责人说,当地各家银行对民营医院放贷把关甚严,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拿到贷款。有一次,医院想购买一栋大楼改善医疗环境,但资金不足,他就托朋友找到当地一家银行。当得知大楼用于民营医院时,银行一口回绝。“这还是托朋友介绍,要是自己去找,连银行的面都见不上。”这位负责人感叹。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晓晶认为,银行应将贷款更多地投放于实体经济,而不是用于支持任何形式的“炒作”。金融机构应对从事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创新贷款模式,鼓励大型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机构,鼓励股份制银行主要从事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这或许能催生新一轮民间资本参股设立小金融机构的热潮,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武钢养猪种菜折射实体经济困境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不断地传出各种抓人眼球的新闻。昨天有报道称,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邓崎琳透露,今年武钢准备建一个万头养猪场,而且年内就出栏。据说,这只是武钢的产业向“非钢”转型的一部分,除养猪以外,武钢甚至准备从事养鸡、种菜、卖盒饭、代家长接送幼儿园孩子、疏通居民家庭堵塞下水道等等。

一家大型钢铁企业,不寻思进一步发展钢铁产业,争取早点跨进“世界五百强”之类的队伍之中,却准备从事似乎有点摆不上桌面的养猪种菜、家政服务业,这样的转型未免有点“黑色幽默”。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幽默故事,而是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做出的产业转型,而透过这样的转型选择,我们从从中解读出的是传统的制造业面临的危机。危机背后,也与中国近年来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的分量越来越轻有很大关系。

武钢所从事的钢铁制造业,曾经在我国最近几十年来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

2 破釜断出实招,为实体经济开拓新空间

“鼓励发展实体经济,要在打破垄断方面出实招。”张晓晶说,目前,我国实体经济投资渠道依然偏窄,民间资本难以进入诸多垄断行业。例如,在石油石化行业,民间资本理论上可以进,但由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几乎垄断了所有石油资源,连新建“非公”加油站也要到它们那里备案,这就从行业上游限制了民企进入,民间资本怎么能放开手脚?

现在,民营经济时时遭遇“玻璃门”、“弹簧门”。例如,一些行业名义上虽然开放,但相关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都由原垄断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或公司掌握。嘴边的“肥肉”岂肯拱手让人?于是民营企业常常面对“表面欢迎、门槛限制”的局面。天津膜天膜科技公司负责人说,他们就曾在参与招投标过程中遭受歧视,被告知“有些项目只允许用特定产品来投标”。

唯有开放竞争,才能激发经济活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指出,当前垄断行业改革明显滞后,造成不公平竞争,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膜天膜公司负责人建议,应让民间资本享受与国有资本同等的政策条件和地位,对民间资本开放市场,给民间资本以新的空间。不仅要让民间资本走进新开放领域,还要让其在新领域中生存下去,尤其不能实行“伪开放”,不能让民间资本“做做点缀、装装门面”。

垄断领域,往往也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发愁的事。山东一位从事家具制作的企业主说:“有时

3 遏制投机炒作,营造实业致富的环境

从炒股、炒楼到炒古玩、炒邮票,甚至炒大蒜、炒绿豆,一个“炒”字让无数人为之疯狂。束庆年认为,资本都是逐利的。如果虚拟经济利润长期居高不下,资金必然更愿意“归顺”。要让人们真正安心做实业,光靠劝说远远不够,必须坚决遏制投机炒作行为,让虚拟经济回归合理水平,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这是让干实业的人感觉到有奔头、树立实业致富理念的基本前提。

其中,遏制楼市投机炒作至关重要。房地产行业存在的暴利使社会各路资金如蚁附膻,不仅造成房价虚高、民怨沸腾,更令实体经济受挫。如今,楼市调控初见成效,但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楼市价格整体依然处于高位,并存在继续上涨压力。今后要继续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还要规范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在土地出让金的使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销售等方面建立更规范的制度。

近年来,A股市场发展迅速,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圈钱致富的工具,普通投资者难以从中受益。大量实体经济转向股市从事投机交易,牟取暴利,破坏证券市场正常秩序;一些上市公司也直接扮演投机者角色,不把从股市融到的资金投入生产,反而炒作各种资产。专家建议,中国股市应当以上市公司分红为主轴开展新一轮制度改革,使股票市场从“股民互搏”变成真正的投资市场;更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制度,加强

候想找某些政府部门办事,等前伺后、毕恭毕敬,结果未必能办成。”业内人士认为,真心实意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投资,政府就必须增强服务意识,降低民营企业的办事成本。否则,无论开放多少有吸引力的领域,民间资本也不敢大规模进入。

博益(天津)气动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破釜断,关键还要有细则可依。例如,国务院曾发布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明确提出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信建设,允许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但是,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能达到多少?参股后有没有话语权?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这些问题都语焉不详,需要进一步制定细则。

为实体经济开辟新空间,还需要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产业升级。博纳艾杰尔科技公司负责人认为,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中国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出口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依靠低价在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加速推动技术创新,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但是,大多数民企的技术创新能力比较有限,转型升级的成本较高,亟待政府予以支持。

技术创新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更需要体制激励、市场化激励,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预。当前,全球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都与政府标准的引导相关,如节能减排标准带动设备更新改造、建筑材料改进等。因此,政府应加强激励性制度设计,建立更科学的标准体系,推动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升级,在新的领域大展拳脚。

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发展,提振股市信心。

去年,江浙地区不断传来民企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清算的消息,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趋紧、自身经营不善之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不足更是重要因素,这直接导致当地民间借贷行为泛滥。一些原本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大举进军民间借贷市场,成立担保公司、放高利贷等。在浙江、安徽等民间资本聚集的地区可以看到,许多写字楼都存在大量冠以“投资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名义的机构,有不少都在做着“高息揽储、高利贷”的生意。

资本之所以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投机炒作,根子是现有金融体制难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认为,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势在必行。要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放宽对设立小型金融机构的限制,成立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不仅如此,由于利率尚未市场化,银行业普遍存在高利润,例如当前银行业人均净利润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2倍,这严重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获利空间。应当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银行存贷款利率过大的问题。

除了楼市、股市、借贷市场,农产品、古玩、字画等领域也常现投机炒作行为,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助长了部分居民幻想“一夜暴富”的心理。解决这些问题,还有赖于政府部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对市场交易的监测和监管。

崔鹏



替罪羊

茅台想成为奢侈品的梦,终究是一波三折。3月份茅台价格明显回落,单瓶价格大跌400元,领跌高端白酒……

当前“三公消费”话题再次于全国“两会”期间升温,而“地球人已经阻止不了涨价”的茅台酒,更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慕德贵坦陈,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说茅台成了一次三公消费的“替罪羊”。

焦海洋/图

尊重不同的观点是一种政治文明

代表委员各抒己见,民意充分表达,两会是观点的海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言论,有些让公众听着舒服,也有一些让人听着不舒服,甚至刺耳。比如,官员子女出国留学一向被抨击,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干部子女。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官员子女也是公民,这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领导把子女送出国学习只是一种选择,甚至不是他本人的选择,是他子女的选择。

宗立成委员不是官员,所以他说这番话绝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是在通过讲理引导舆论理性看待问题。公众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干部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公开透明符合程序;官员子女出国更不是问题,这是他们的权利,关键是父母的财产来源要正当,出国也没有利用父母的权力资源。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官员子女出国留学都一棍子打死,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两会代表委员的言论中有不少与“公众的期待”不同,公众要学会尊重,而不是一觉得不顺耳就斥之为“雷人雷语”。

比如,针对舆论痛斥的“茅台助公款吃喝腐败”的问题,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坦言,三公消费高不能怪茅台。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高的根本原因——将所有问题都一古脑儿地推给体制,这种思维不一定对。这位来自茅台生产地的副省长所言也有合理性,茅台只是酒,它无法承担助长三公消费这么大的职责,公款吃喝关键是财政监督不到位,这种情况下,没有茅台,也会有其他“台”流到官员的胃里。

还有联想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小兵的话也很不招公众待见,面对舆论“降低电信资费”的吁求,他说:消费者也不能无止境地要求电信资费下降,下降到这个行业没有能力建设,倒霉的还是消费者——这话,消费者当然不爱听,可超越消费者的立场,还是能从中看到合理性的。而且,站在行业立场捍卫行业利益,也没什么不正当的。两会参政议政,本就是一种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制度平台。

尊重这些不同的观点,甚至刺耳的言论,是一种政治文明。公众可以不同意这些观点,但一定要捍卫这些代表委员自由表达的权利。两会参政议政,并不是让代表委员说一堆让公众听着很舒服的话,在迎合和揣测民意中进行一番合唱。两会的意义,不在于“相同”,恰恰在于“不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不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共商国是,不同立场的人通过提供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和博弈,在争论中寻求共识。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废话,引起一些毫无意义的共鸣,迎合民众的情绪说一些看似过瘾的片儿汤话,对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助益。

所以,我欣赏那些代表民意进行表达的代表委员,我同样欣赏那些不迎合、不取悦所谓主流民意的代表委员。民意并不一定代表正确,大众受认知和情绪的影响,有些看法确实缺乏理性。公众可以辩论,但不要在道德上进行贬低甚至群起攻之。这样的舆论暴力,可能会堵塞两会的言路,让代表委员噤若寒蝉——比如就有一些委员在遭遇媒体痛批后,准备当“哑巴”了。让代表委员独立地言说,也许比说什么更重要。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在不同中寻求妥协让步,而不是相同中强造和谐团结。

曹林

行业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出现萎缩,也不会对其整体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长期以来偏重于以投资为先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经济结构已经失衡,特别是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推崇,导致各地的实体经济出现了萎缩,面对宏观调控的压力,很多地方的实体经济已经无法支撑起维持经济健康运转的功能,以致像武钢这样的企业不得不以转型求生。

武钢选择向“非钢”转型,显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市场调研,对未来的市场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已经宣布今年我国GDP的增长目标定位为7.5%,这是我国在8年来首次将这个指标定在8%以下。可以想见,只要这个目标得到严格执行,那么,各地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中将有一大批被压缩,那么,钢铁企业的产品市场将进一步表现为萎缩。武钢的转型,走在其他钢铁企业的前面,这正是它有前瞻眼光的体现。

周俊生